

檢視 2010 年代的 跨大西洋關係 安全與經濟關係發展*

賴昀辰**

收稿日期：2020 年 4 月 15 日

接受日期：2020 年 11 月 25 日

* DOI:10.6164/JNDS.202012_20(1).0001

本文接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計畫編號 106-2410-H-259-060）。在此特別感謝審查人以及《國家發展研究》編委會的寶貴意見和指正。

** 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歐盟研究中心執行長，E-mail: yunchen.lai@gms.ndhu.edu.tw。

摘 要

二次大戰以來美歐同盟主導著國際政治舞台。2010 年代大西洋兩岸政治發展的許多現象，包括英國脫歐、美國自 2016 年起由政治素人川普掌政、民粹在 2016 至 2018 年間的許多歐洲大選包括德奧義法大有斬獲等，影響了當地國內政治的同時也改變了國家對外政策，進而衝擊了跨大西洋關係。本文觀察 2010 年代，主要為英國脫歐公投及川普掌政後，大西洋兩岸在安全合作及經濟合作上的發展，包括大西洋兩岸透過北約的合作及歐盟與北約的競合，以及美歐近期在 TTIP 談判上的挫折，發現美歐關係在安全上的調整比經濟上的調整來得更為迅速順利。造成美歐關係在安全與經濟發展不同速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為反全球化引起的泛政治化效應對於國際經濟合作的質疑，其二為美歐關係在政治與經濟上的關係本質差異—政治面為依賴關係，而經濟關係則是既合作又競爭。未來美歐關係的挑戰一則是如何回應反全球化浪潮對於國際合作的質疑，一為如何在英國脫歐後調整美歐英三角，重新鞏固大西洋關係。

關鍵詞：跨大西洋關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反)全球化、英國脫歐

壹、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大西洋兩岸的國際行為者，包括美國以及歐洲強權，透過國際建制及合作，共同推動民主、自由、法治、市場價值，形塑當代世界政治。雖然美國與歐洲之間並未有明確的同盟條約，但其自冷戰以來所建立的合作關係，在國際社會上塑造了美歐同盟，¹ 牽動國際安全與全球經濟。自 2010 年以來，在西方經濟表現不良的情況下，一方面西方民眾對既有建制不滿及對全球化感到焦慮、一方面新興強權正主張新價值挑戰西方規範 (Bremmer, 2016)，故 2017 年慕尼黑安全會議認為世界正面臨了一個走向極端、自由限縮的變動時刻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2017: 6)，公民對當代政治經濟提出重重質疑，帶來民粹復興的契機，遂引起目前學界逐漸關注的「泛政治化現象」(politicization)；而新興強權更在此國際結構下，對現今由西方強權主導國際秩序提出挑戰。

以上的內外挑戰衝擊了大西洋兩岸，歐洲為了難民危機及移民融合問題忙碌、美國逐漸走向孤立主義，而這更使彼此對如何適應改變中的世界局勢越來越不同調。在如此紛亂的國際情勢下，英國在 2016 年公投決定脫離歐盟、川普在同年當選美國總統、民粹主義更在數場歐洲大選獲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以上事件為世界政治投下震撼彈，不僅衝擊歐美內部，更為跨大西洋關係及世界政治帶來變局。許多人視

¹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以馬歇爾計畫協助西歐盟友，包括法英聯邦西德乃至於荷比盧義大利等，協助歐洲在戰後復甦經濟，並同時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作為美國與歐洲國家之間的安全建制，以雙軌在經濟與安全上建立了緊密的美歐關係。雖然美國與歐洲國家之間未有明確的同盟協定或條約，但基於美國與歐洲之間緊密的經貿往來與安全共同體關係，國際社會上普遍認可美歐同盟的存在。冷戰結束後，歐洲共同體改組為歐盟，成為美歐關係之間的歐方基石。為使研究更為聚焦，本文所稱之「跨大西洋關係」、「美歐同盟」、「美歐關係」等，界定為美國與歐盟之間的關係。

這一連串的發展是對戰後自由國際秩序架構的反擊 (Larik, 2018: 3)，造成美歐英三輪局面，改變了大西洋兩岸行為者在世界舞台的地位，進而影響跨大西洋關係。

2010 年代的英國脫歐在國際政治引發波瀾，加之川普上任、歐洲民粹主義興起後，國際情勢詭譎，國際社會近來遂針對局勢演變作出因應。本研究企圖分析 2010 年代，特別著重分析在英國脫歐公投及川普掌政後，² 跨大西洋關係，亦即美國與歐盟之間，在新局勢下有哪些變化及調整。

在研究標的上，安全與經濟一般被視為跨大西洋關係兩大支柱，故本文以安全與經濟兩面向為研究客體，分析美歐同盟在安全與經濟關係上的發展與調整，藉此觀察美歐同盟的本質及面臨的挑戰。由於安全與經濟涵蓋廣泛，為使探索更能聚焦，因此分別選定了安全及經濟合作的案例作為分析槓桿。美歐同盟的安全合作展現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北約)，而北約與歐盟近年來發展防衛能力的意向有所競合，因此在安全上，將觀察歐盟與北約之間的競合調整。而在經濟面上，美歐在 2010 年代最大的經濟合作嘗試為開啓了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協定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以下簡稱 TTIP) 談判，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於跨大西洋關係在此二議題上的互動。另外，英國脫歐公投及其後帶來的一連串政治風暴為 2010 年代跨大西洋關係中最重要的政治發展之一，其帶來的一連串談判已影響跨大西洋關係。故在探討此二案例時，將

² 本文研究時段著重在 2016 年 6 月到 2019 年 3 月，因 2010 年代最重要的國際事件英國脫歐於 2016 年 6 月通過、川普於同年 11 月當選為美國總統並於 2017 年 1 月上任。而英國於 2017 年 3 月 29 日根據里斯本條約第 50 條啟動脫歐程序，里斯本條約第 50 條的 2 年協商期於 2019 年 3 月 29 日屆滿。雖然英國至 2020 年方正式脫歐，但國際社會因預期英國將於 2019 年 3 月 29 日脫歐，已因應此時點做出各種準備，故本文以 2019 年 3 月 29 日作為主要研究切點。

特別分析英國在其中的角色。

美國及歐洲在 2010 年代面臨了公眾意見上升、社會極化等泛政治化現象的衝擊，這使得政治菁英在進行國際合作時受到制約，而這樣的制約顯現在美國及歐洲的同盟合作上，然而面臨同樣的限制，美歐於經濟與安全關係的發展在成果上卻有所差異。在安全上，雖然英國脫歐及川普掌政的結構下，歐洲希望在安全走向更為自主進而建構的歐洲防衛能力，這一度被認為將衝擊美歐間的北約安全合作框架，但實務的發展卻是北約與歐盟的合作框架獲得強化；反觀一般被認為美歐間存在高度共同價值的貿易合作，卻在英國脫歐及川普掌政下未能取得成果。本文遂試圖探討 2010 年代的跨大西洋關係在經濟與安全上做了哪些調整？以及造成調整差異的原因為何？研究架構上，本文將先觀察實證面上美歐在經濟與安全兩研究標的上的發展與調整，接著比較經濟與安全調整步伐的差異，然後以層次分析法及包括泛政治化現象及現實主義理論，來解釋造成經濟與安全發展差異之原因。

貳、反全球化浪潮下跨大西洋強化經濟合作之嘗試：以 TTIP 為例

經濟合作一直以來為美歐關係之重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以馬歇爾計畫援助歐洲，建立了美歐之間的經濟連結，而今美國在歐的投資為其在亞洲投資的三倍；歐盟在美國的投資則為其在中印投資加總的八倍，可見美歐之間緊密的經濟連結。歐盟甚至認為，美歐之間相互的投資為跨大西洋關係的動能，甚而形塑了全球經濟。³ 然而儘管美歐之間有著緊密的經濟連結，但美歐之間卻無獨立的經濟合作協定，為強化美歐間的合作關係，歐巴馬總統在 2010 年代提出建立

³ <https://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countries/united-states/>.

TTIP 的構想。雖然 TTIP 談判因參與行為者共識不足而最終停滯，但其背後的新自由主義思維反映了美歐經濟合作的核心價值，故 TTIP 談判過程及命運值得探究分析，作為未來持續觀察美歐經濟合作的重要事例。因此本文在跨大西洋關係的經濟合作觀察上，將著重分析 TTIP 談判，以此案例作為思考美歐未來經濟合作發展的借鏡。

TTIP 在反全球化浪潮高漲下，先因其去管制化意向帶來的衝擊在歐洲內部備受質疑，後又因川普對自由貿易協定的質疑而暫時中止，而英國脫歐公投展現出的反全球化力量更衝擊了 TTIP 的發展。英國是 TTIP 談判中最活躍的行為者之一，因此英國脫歐對 TTIP 談判帶來挫折，而英國脫歐公投更象徵反全球化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撲，故英國脫歐事件對美歐未來繼續以新自由主義塑造經濟合作的努力帶來打擊。

TTIP 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TTIP 的進程因此反映國際社會對新自由主義的看法，TTIP 的發展或停滯可作為觀察新自由主義是否能持續主導國際經濟秩序的切入點。本節將先探討 TTIP 在反全球化浪潮的衝擊，接著分析英國在 TTIP 中扮演的角色以思考英國脫歐對 TTIP 的影響，最後從反全球化運動及英國角色思考跨大西洋關係在經濟合作的發展與限制。

一、反全球化浪潮與 TTIP

美歐同盟以自由主義思維塑造了戰後國際經濟秩序以取得國際經濟舞台主導地位，然近年新興強權崛起，美歐的經濟強權地位面臨挑戰。美歐於是在 2010 年代嘗試創建 TTIP，希望能強化雙方之間的經貿合作，打造跨大西洋之間的自由貿易區。TTIP 一方面可以經貿合作加強美歐同盟的經濟實力，一方面此經濟同盟預期可以強化美歐戰略夥伴關係 (Oliver and Williams, 2016: 562)，因此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 (Hillary Clinton) 就認為 TTIP 是個「經濟北約 (an economic NATO)」 (Defraigne, 2014)。

TTIP 是 2010 年代跨大西洋關係在經濟合作面上最具體的計劃，但卻受到反全球化運動的抵抗。華盛頓共識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思維加速了全球化進程，新自由主義政策重視總體經濟的成長，但對經濟成長後的社會分配卻相對忽略，於是全球化帶來總體經濟成長的同時卻也伴隨著貧富差距擴大的副作用出現，而這在全球化蓬勃發展的美歐社會尤其明顯。學者就認為，高收入國家的人民在近年全球化現象中都是輸家（Williamson, 2005; Rodrik, 2017），因此近年公眾反全球化運動在西方世界高漲，甚至帶來民粹主義崛起問題。強調去管制化的 TTIP 是全球化的再度展現並帶來近一步的全球化現象，因此反對 TTIP 成為反全球化運動的重要戰場。

對大西洋兩端領導人及企業來說，TTIP 可望刺激美歐經濟；然對公民而言，TTIP 卻存在去規則化帶來的社會成本及分配問題（Venhaus, 2015）。反全球化者關心總體經濟成長下的社會正義議題，而這與脫歐派論點重合，因此 2010 年代的反全球化運動支持了反 TTIP 運動，英國脫歐公投的成功則強化了反 TTIP 運動的信心。

TTIP 希冀能消除美歐間的非關稅障礙，以規則鬆綁來為企業削減成本，然而這些非關稅障礙常是為公共利益而存在，如保護環境、保障消費者利益，或是確保勞工福利。因此 TTIP 反對者認為規則的鬆綁損害了公民及弱勢階層的權益，批評執委會只考慮為企業降低成本，卻未考慮這樣的去規則化對人民生活、環境、經濟造成的威脅。

TTIP 帶來多方面影響，包括勞工、農業、食品安全、隱私、醫療、金融等（賴昀辰，2016：121-158）。在勞動方面，弱勢產業的勞工面臨失業問題；在農業面，歐洲地狹人稠限制下的小農產業不敵美國農商企業擁有的幅員廣闊資源；在食品安全面，TTIP 使美國廠商不須受歐盟食品安全及預防原則的管理規則規範（Bizzarri, 2013），故對消費者來說，TTIP 為不受歡迎的美國基改產品打開市場。另外為保護智財權，TTIP 重新推動已遭歐洲議會否決的「反仿冒貿易協定」（Anti-

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以允許網商取得使用者資料，而這被認為有侵害公民隱私權疑慮。在醫療面，TTIP 提高專利保護後，民眾取得藥物成本升高並帶來醫療產業私有化，使民眾擔憂醫療服務費用將大幅上升。

全球化下浪潮下，弱勢族群在以上失業問題、農業問題、食安問題及醫療問題中首當其衝，反全球化論者因此認為 TTIP 將加大社會不公。2007 年金融海嘯後，新自由主義正當性開始受到質疑、全球化受到批評。越來越多人認為新自由主義只強調經濟成長，卻無法保證成長果實能為全民共享 (Stiglitz, 2014)，而全球化對社會的衝擊卻由全體社會成員共同承擔。在這樣的情況下，基於新自由主義理念推動的 TTIP 在歐洲面臨公民強烈反對，並與英國離歐派之論述重合。離歐派之成功為反 TTIP 浪潮提供強心針，加強了質疑 TTIP 的力道。

而在美國方面，一方面川普本身對於自由貿易協定高度質疑，一方面川普的當選反應美國民意轉向孤立保守。在這樣的氛圍下，美國在 TTIP 談判中妥協的空間越來越少。早在歐巴馬時期，法國外交部次長費克 (Matthias Fekl) 就曾評論 TTIP 沒有進展是因美方不肯妥協，⁴而川普上台後，對於續談 TTIP 態度反覆，無意談判，因此更遑論妥協的可能性。簡言之，英國脫歐使得保守、反全球化的美國民意更為確立，加上川普採取的反區域自貿協定的政策與其代表的強大反自由貿易民意，成為 TTIP 談判的巨大阻礙，造成 TTIP 談判停滯的命運。

二、歐盟會員國的角色：英國在 TTIP 協商中的角色

上述提及美方對於 TTIP 的態度受到政黨更迭而反覆，在歐洲，則是不同會員國對於 TTIP 的支持力道有所不同。在德國，雖然總理梅克

⁴ <https://global.handelsblatt.com/exclusive-french-minister-says-ttip-will-fail-unless-u-s-compromises-677692>.

爾 (Angela Merkel) 強調自由貿易協定可以帶給歐盟更多的就業機會，但社民黨的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加布里爾 (Sigmar Gabriel) 卻時不時公開批評 TTIP，並認為 TTIP 談判本質上已失敗。⁵ 而德國公眾對於 TTIP 的反對聲浪更是一直很高，質疑 TTIP 會削弱歐盟現行的社會、衛生及環保標準，而協議中的仲裁機制更會削弱公共決策權，強化跨國公司權力，因此德國人對 TTIP 的支持率從 2014 年的 55% 到 2016 年僅剩 17%。⁶ 而法國、奧地利也表示反對 TTIP，如法國總理瓦爾斯 (Manuel Valls) 在 2016 年時要求停止談判，⁷ 而法國總統歐蘭德 (Francois Hollande) 也表示談判陷入僵局且失去平衡，⁸ 因此不會在歐巴馬任期完成談判。⁹

在眾多歐洲國家對 TTIP 提出質疑之際，英國則是對 TTIP 支持最不遺餘力之歐盟會員國。英國以商立國 (張鳴，2012：32)，為自由主義最忠實的信仰者，基於對新自由主義的理念，英國是 TTIP 的重要支持者 (Lightfoot and Oliver, 2016)；而在政治方面，英國認為 TTIP 有重要戰略意涵 (House of Lords, 2014)，因其能加強美歐關係，將美歐從多層次捆綁在一起，因此英國國會就認為 TTIP 的推動符合英國

⁵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8/160828_german_us.

⁶ <https://internationalnewsstation.tw/?event=%E6%B0%91%E8%AA%BF%EF%BC%9A%E5%BE%B7%E5%9C%8B%E4%BA%BA%E5%B0%8Dttip%E6%94%AF%E6%8C%81%E7%8E%87%E5%83%8517>.

⁷ <http://www.rfi.fr/tw/%E6%94%BF%E6%B2%BB/20160917-%E5%BE%B7%E5%9C%8B%E6%95%B8%E5%8D%81%E8%90%AC%E4%BA%BA%E4%B8%8A%E8%A1%97%E5%8F%8D%E5%B0%8Dttip>.

⁸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eu-trade-0831-idCNKCS11605M>.

⁹ <https://internationalnewsstation.tw/?event=%25E6%25B3%2595%25E5%25A4%2596%25E8%25B2%25BF%25E9%2583%25A8%25E9%2595%25B7%25E8%25A6%2581%25E6%25B1%2582%25E7%25B5%2582%25E6%25AD%25A2TTIP%25E8%25AB%2587%25E5%2588%25A4>.

國家利益。

在經濟面，TTIP 預期為英國帶來每年 100 億英鎊的收入增長，占歐盟總增長的 1/10 (House of Lords, 2014: 24; Francois et al., 2013)。在進出口面，英國在 TTIP 完成後的出口總量預計成長為 4.2%，為德國 2.1% 的兩倍，是歐盟總體的 1.83 倍。在就業率以及工資變化方面，英國也是最大的受益者。根據德國經濟研究資訊院的報告，TTIP 可為英國的就業帶來 1.38% 增長、減少 1.27% 的失業，是歐盟成員國中唯一變化超過一個百分點的國家。在實質工資成長方面，英國的實質工資成長可達 6.6%，居所有成員國之冠 (Bendini and De Micco, 2014)。若更進一步觀察全體國民的話，可發現 TTIP 為英國實質人均所得帶來的變化效果在世界上亦名列前茅，高達 9.7% 為歐盟國家之首，僅次於美國的 13.4% (Felbermayr et al., 2013)。由上可知，TTIP 為英國帶來利益，因此英國大力推動 TTIP (House of Lords, 2014: 33-34)。

上述英國可享受的經濟成長立基於全方面削減非關稅障礙 (Bendini and De Micco, 2014)，英國遂極力推動非關稅障礙協商 (Oliver, 2016; Sanchez, 2016)，並且是歐洲國家中最願意放棄社會標準條件的國家 (Crouch, 2014: 176-181)，如英國支持執委會在基改食品部分向美國妥協。此外，英美間的規則較為接近，故英國支持推動美歐間的貿易自由化，如英國上議院的 TTIP 評估報告就認為，英國政府應幫助執委會說服其他立場較強硬的國家 (House of Lords, 2014: 146)。對英國而言，歐盟的規則若放寬，英國受到的影響遠小於其他歐盟成員國受到的衝擊，可帶給英國正面的效應 (House of Lords, 2014)。此外，英國認為 TTIP 的「投資者—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能助英國爭取更多美國投資 (House of Lords, 2014: 169)，因此英國對爭端解決機制的設計亦樂見其成。

英國推動 TTIP 有著戰略及地緣政治考量，因為 TTIP 是跨大西洋關係的再一次確保，補充北約的不足 (Hamilton, 2014)。英國作為美

國堅強盟友，在國家安全生存方面仰賴美國，希望鞏固美歐關係的 TTIP 能夠成型，因此推動 TTIP 是英國的重要利益。英國認為，TTIP 的建立不只有經濟目的，更可建構美歐間的對話框架（House of Lords, 2014: 228），有助於加固美歐聯盟夥伴關係。簡言之，TTIP 屬於英國的重大國家利益，使英國成為 TTIP 時的支持者，而這亦反映出英國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支持。

三、從 TTIP 談判觀察美歐經濟合作前景

英國脫歐公投使 TTIP 遭受挫折。從民意觀之，英國脫歐是反全球化思潮的展現，與反 TTIP 的公民運動之理論基礎重合。從經濟面觀之，在排除對英國帶來的經濟效果後，TTIP 的預期效果大幅降低，不利歐盟說服公民接受 TTIP。從實務面觀之，英國脫離歐盟後將不再參與 TTIP 的談判進程，歐盟將失去最支持 TTIP 的會員國。

2016 年脫歐公投後，歐盟發表了新全球策略，強調歐盟推動自由化的決心（Blockmans, 2016: 182-183）。這份報告指出，歐洲須以貿易開放來確保歐洲的持續繁榮、透過開放市場來建立全球的貿易規則（European Union, 2016），因此歐盟當時就提出 TTIP 是跨大西洋關係的核心，可使跨大西洋關係的重心從北約轉移到 TTIP。簡言之，TTIP 是歐盟重塑在國際舞台重要性的工具，尤其在後英國脫歐時代，世人對歐盟的存續紛紛感到憂心之際，TTIP 是歐盟以經濟實力重新展現其全球影響力的重要武器。

雖然歐盟將 TTIP 視為重新展現團結與經濟影響力的工具，但英國脫歐後，TTIP 失去英國的支持，使布魯塞爾在續推 TTIP 的努力上遭受阻礙。英國是 TTIP 中最大的受益者，這意味著對其他會員國來說，TTIP 的誘因不如英國來得大。美國國會的國情分析因此指出，基於英國在貿易自由化議題上扮演的角色，英國脫歐對已遭遇挫折的 TTIP 帶來不確定性（Akhtar, 2017: 24），貿易專家因此認為若沒有英

國，TTIP 在短期間很難達成協議（Lawder, 2016）。

在民意上，TTIP 在歐陸因反全球化浪潮陷入困境，而英國脫歐公投的成功鼓舞了反全球化力量，對反 TTIP 的勢力帶來示範及鼓勵，展現阻擋全球化進程的可能性（Blockmans, 2016: 182-183）。雪上加霜的是，反全球化力量代表的川普，在脫歐公投後不到半年被選為美國總統，中止了 TTIP 談判。

川普從競選階段開始，即反覆強調多邊區域機制及貿易體制隱含了偏差及體制上的無能，導致美國貿易赤字及失業問題。其認為美國過去所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僅使美國背負開放責任，但貿易伙伴卻未能同等開放，因此美國必須追求「公平貿易」，透過雙邊談判建構對美國有利的貿易（周子欽，2020：63-92）。因此川普在上任後旋即宣布檢視所有的自由貿易協定，針對美國貿易政策進行調整，並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以及暫緩 TTIP 協商（劉大年，2019：9-21），導致 TTIP 目前面臨中止的命運。

大西洋兩岸是形塑當代以自由主義主導國際經濟秩序的主要行為者，但大西洋兩岸以自由主義精神為基礎設計的 TTIP 卻在大西洋間遭受挫折。這顯示經濟議題已成為公眾關注的熱點，未來美歐間若要進行經濟合作，則除了領導人的決策及利益團體的立場外，更需要受到公民的檢視。美歐之間以 TTIP 強化同盟關係的嘗試目前看來失敗，但 TTIP 談判及命運卻為未來美歐經濟合作帶來重要啟示。這個啟示是，新自由主義理念下的自由開放所帶來的財富若不能被妥善分配，則這樣的開放嘗試在當代將會受到反全球化浪潮的高度質疑。

雖然 TTIP 在反全球化浪潮下停滯不前，但美歐之間的經貿往來卻未因此下降，而仍持續上升（見圖 1），顯見反全球化運動雖然阻撓了 TTIP 的形成，但是否阻擋了全球化的潮流仍有待商榷。雖然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 TTIP 失敗了，但就現今的發展來看，美歐之間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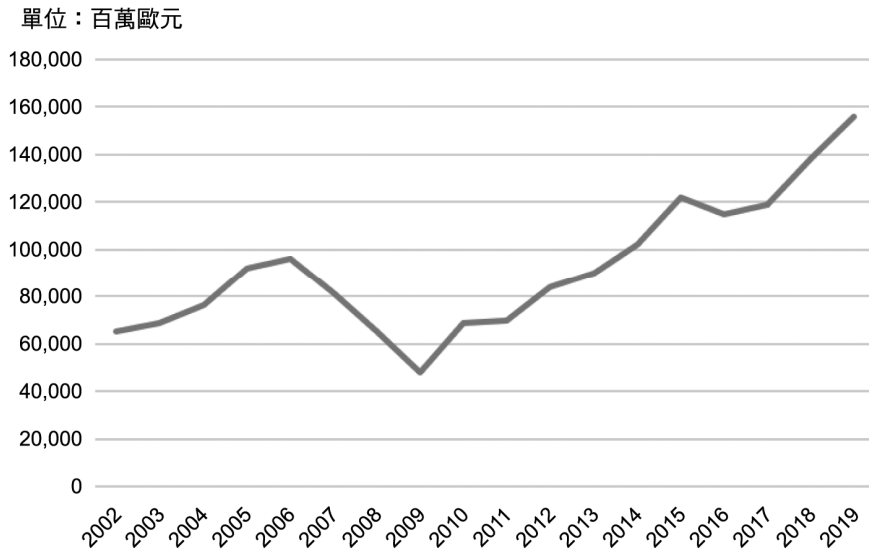


圖 1 歐美貿易額變化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¹⁰ 作者自繪。

經濟合作上的邏輯上仍不脫新自由主義，如美歐於 2018 年提出的「零關稅區」構想，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再一次展現。「零關稅區」構想中雖然未提及 TTIP，但細究合作內容的零關稅、零非關稅障礙、零補貼等方向，事實上與 TTIP 不謀而合，充滿了新自由主義的開放色彩。零關稅區的實際設計目前尚未明朗，若能形成將會是美歐同盟間最新的貿易關係調整。然鑑於其與 TTIP 的重合性以及背後所蘊含的新自由主義理念，美歐零關稅區構想是否會如 TTIP 在反全球化浪潮高漲的

¹⁰ <https://appsso.eurostat.ec.europa.eu/nui/submitViewTableAction.do>
參數設定為 Time: 2002-2019、Partner: US、External trade indicator: Trade balance in million ECU/EURO、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 (SITC Rev. 4, 2006): Total – all products、Geopolitical entity (reporting): European Union-28 countries (2013-2020)。

時代受到民意的反彈，將值得思考；而新自由主義主要支持者之一的英國在離開了歐盟後，其是否加入美歐規劃的零關稅區構想亦值得關注。若英國加入美歐零關稅區，則英國在脫歐談判時因欲脫離歐洲自由關稅區所遭受的衝擊及動盪將顯得諷刺；但若無英國的加入，則在民意對新自由主義的質疑下，美歐進一步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進行的經濟合作可能會面臨更大的挑戰。美歐需將 2010 年代推動 TTIP 的失敗案例作為未來設計強化經濟合作體制時的借鏡，妥善處理經濟合作時可能面臨的反全球化的訴求，才能夠降低公民的反彈，如此進一步帶來全球化現象的經濟合作才有可能能夠進行。

參、跨大西洋安全合作關係：以北約為例

安全需求是美歐同盟最堅實的基礎，而這展現在北約之上，然而美國總統川普對北約多所批評；而英國作為歐盟重要軍事會員，其脫歐一方面對歐盟的安全防衛政策帶來改變，一方面其與歐洲強權關係的改變，亦對北約中的大西洋合作關係造成影響（Brânda, 2017: 75）。因此 2010 年代的政治發展不論是英國脫歐或者是川普掌政，皆對跨大西洋安全關係有所影響。

歐盟與北約的成員多所重疊，因此歐盟與北約間有共享戰略利益，也面臨相似的威脅與挑戰。歐盟在里斯本條約後，致力於在共同安全與防衛政策（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以下簡稱 CSDP）下加強防衛能力。英國是歐盟會員國中軍事能力最強的國家，英國出走後之空缺該由誰填補成了歐盟安全能力發展的重要課題。德國基於歷史遺緒，國內對於是否要發展軍事能力一直有強烈的辯論及雜音，這使得法國成為歐盟成員國中唯一擁有政治意志及行動能力的國家（Vukadinović et al., 2017: 22）。一向主張歐洲獨立自主的法國嚮往獨立的歐盟防衛能力，如法國總統馬克宏於 2018 年 11 月提出建立歐洲

軍隊的構想，但其他會員國卻不是十分熱衷。且法國素來不願與美國走得過近，使得歐洲國家要如何處理與北約的關係成爲一個值得密切關注的議題，而歐盟與北約關係的調整更決定美歐同盟在安全合作上的走向。本節梳理大西洋兩岸行爲者對於歐洲安全的看法，並討論大西洋兩岸行爲者因應川普掌政及英國脫歐，在合作關係的調整上做了哪些努力。另由於目前的調整很大的程度是因應英國脫歐，因此本節亦分析英國在大西洋安全中的角色。

一、北約與歐盟在歐洲安全議題上的競合

北約爲由美國主導的西方陣營集體防禦組織，可說是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的基礎（湯紹成，2000）。而隨著歐盟建立，歐洲各國亦逐漸思考加強歐洲獨立自主能力（Freedman, 2016: 7-12）。對於超國家主義者來說，若希望將歐盟建立成爲類國家行爲體就必須讓歐盟擁有自己的武力；而對歐陸主義者而言，在希望歐洲能夠更爲獨立於美國影響力的考量下，亦支持建構歐洲自主防衛能力（賴昀辰，2020：133）。因此冷戰結束以來，歐盟一直嘗試在歐洲安全上有更多投入。

歐盟建立軍事合作體系的嘗試將使歐盟及北約將在功能上有所重疊；而此二組織的組成成員有一定的重合度，因此在競爭會員國的軍費支出上有著矛盾，學者因此認爲歐盟與北約間有著競爭暗流（Valasek, 2007）。除任務重疊與資源競爭外，北約與歐盟在對外關係的立場，主要是對俄立場有所矛盾。

比較俄羅斯對美及對歐的威脅，從地緣政治、經濟往來，乃至於能源安全的思考，歐洲國家對於俄國的敏感度遠大於美國的感受。就地理接近度，歐盟國家特別是新中東歐會員，比美國來得更接近俄國，其威脅感更深。從經濟因素，俄羅斯僅爲美國第 23 大貿易夥伴，但對歐盟來說，俄羅斯是歐盟的第三大貿易夥伴（Bremmer, 2016）。此外，在能源安全上，德國及東歐國家的俄羅斯能源進口占比極高。鑑於以

上原因，許多中東歐歐盟會員國認為不應與俄羅斯關係過於緊張，故希望能鬆綁對俄制裁（Bremmer, 2016），而這與美國立場及西歐立場略有差異。

美歐軍事支出的差異亦是大西洋在安全合作緊張的原因之一。歐洲防衛支出的低 GDP 占比飽受川普批評。川普一直主張歐洲未對自己的安全承擔足夠責任。根據北約規章，會員國之軍事支出應至少佔 GDP 的 2%。然而據 2014 年資料，歐盟會員國中僅有希臘及英國達此標準。¹¹ 若以絕對值來看，美國的軍事支出是歐盟 28 個會員國的四倍。而除了軍事支出過低之外，軍事裝備佔軍事支出比不足亦為另一批評重點（Dennison and Oliver, 2018）。

歐洲在俄羅斯議題的猶豫及軍事支出的差異，顯示了美歐的利益分歧。雖然為同盟，但大西洋兩端甚至是歐洲內部中一直有著若干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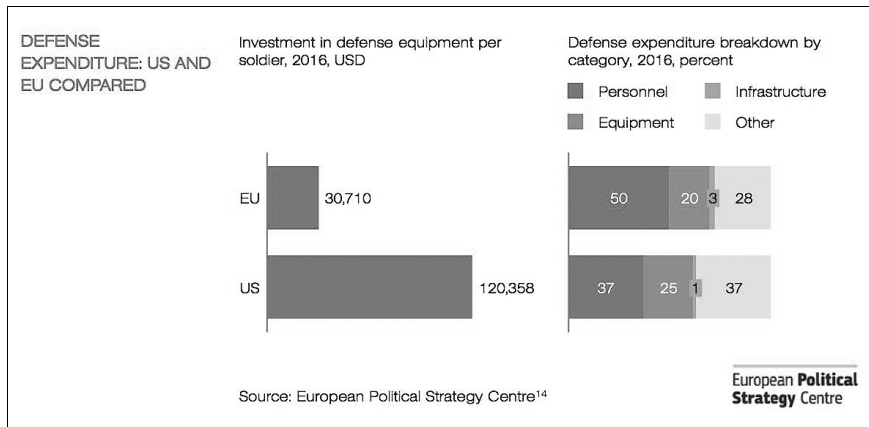


圖 2 美歐軍事支出比較

資料來源：慕尼黑安全會議報告（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2017）。

¹¹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pdf_2018_07/20180709_180710-pr2018-91-cn.pdf.

見存在，如冷戰時歐洲對美國的「彈性反應戰略」感到不滿，而美國對歐洲的軍事投入程度頗有微詞。這樣的分歧在冷戰時被意識形態衝突及共同安全威脅掩蓋，但冷戰結束後，俄羅斯的威脅下降，歐洲內部以及大西洋間的差異逐漸浮現，成為北約與歐盟競合關係中的議題。

北約代表美國在歐陸的影響力，由 2015 年北約會員國的預算貢獻來看，美國超過 3/4 (Dimitrova, 2016: 2)，另外，北約最高指揮權之職位也掌握於美國。做為北約核心領導者，美國不樂見北約被弱化，因此美國對歐盟建立自主防衛能力的企圖持保留態度 (Valasek, 2007)。此外不只美國支持北約，歐洲內部亦有大西洋主義者，如英國及東歐。冷戰結束後，因為對 CSDP 信心不足，許多歐盟新成員國呼籲北約在其境內建立常設基地以讓美軍駐紮在東歐 (Bugajski, 2016)。雖然歐盟逐漸在維和行動及人道任務中展現能力，但就實際層面來思考，北約仍是現今歐洲最有效的安全保護。

北約的存在有著重要價值。若從現實主義觀點來看，北約在冷戰後的持續存在對穩定歐洲及大西洋區域有長足貢獻，且其介入的區域不只是會員國所在地，而是更開放與包容的介入其他安全問題 (Vukadinović et al., 2017)，如藉由地中海對話或者是全球合作夥伴建立與北非、拉美的關係，因此新現實主義認為北約的成功轉型穩定了世界政治，有存在的價值；在制度主義的觀點上，北約是美歐安全合作的基石，北約必須持續作用，方可成為美歐進一步合作的基礎；而以社會建構主義來觀察北約，北約的存在展現了西方聯盟以硬實力來聯繫跨大西洋關係及穩定國際安全的「意志」，藉此威懾潛在的安全破壞者。因此北約除了實質的軍事行動外，其存在的本身對於國際安全的穩定有重大象徵意義。然而歐盟希望能增加防衛自主能力的意向，無可避免帶來與北約任務重疊及資源競爭。鑑於以上北約存在的必要性，歐盟與北約間的關係須謹慎處理，而這是美歐同盟中的重要課題。

二、英國在跨大西洋安全合作中的角色

雖然跨大西洋兩岸在安全上有著共同利益，但彼此在資源及領導權上偶有競爭，此外對俄羅斯議題的立場、軍費支出的差異等，造成跨大西洋關係在安全合作議題上存在矛盾關係。在這樣的矛盾關係中，英國同時身為美國特殊夥伴及歐盟成員，一直扮演著平衡兩者之角色，如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曾言「北約是美國安全的基石，而美英聯盟是此基石之核心」（Brânda, 2017: 75）、美國前國務卿萊斯曾說「若歐洲轉向一個歐陸的歐洲，那麼歐洲將變得十分不同」（Oliver and Williams, 2016: 559），可見英國在歐洲的角色對美國的重要性，這反映在北約與歐盟的競合上。

在美英特殊關係的考量下，英國的立場為希望北約與歐盟可密切合作（Valasek, 2007），因此當如法過、德國等夥伴希望歐盟於安全防禦能更獨立自主時，英國對此持保留立場，認為以深化北約合作來防衛歐洲安全為較好的選項（Kienzle and von Weitzershausen, 2017）。英國一直以來致力維持其北約領導角色（Dunn and Webber, 2016: 471-480），觀察英國在北約中的軍費支出，可發現相較其他會員國，英國在軍費的支出向來很高。由 2014 年的軍費支出來看，北約會員國中僅有英國及希臘達到北約的要求；而若以總量來看，英國的軍費支出僅次於美國（Stalenheim et al., 2007: 270）。

另一方面，英國對歐盟的安全有重要價值（Kienzle and von Weitzershausen, 2017）。對歐盟而言，英國軍事能力對歐盟執行 CSDP 至關重要，因為英國貢獻了 25% 的 CSDP 預算，及提供了 10% 的 CSDP 人員（Biscop, 2016: 436）。另外，英軍在兩次世界大戰的軍事經驗亦對歐盟軍事行動有重要價值。簡言之，在實質能力上的核武能力、傳統武力、軍費支出，以及在心理層面的對軍備發展及投入的承諾，再加上與美國的特殊關係，使英國不論對北約或對歐盟而言，在歐洲安

全議題中皆扮演重要的角色（Dunn, and Webber, 2016: 471-480; Yost, 2014: 22），而美英特殊關係更使英國得以在北約與歐盟的競合關係中扮演協調者（Stokes et al, 2013）。

英國脫歐一方面使英國更傾向支持北約，另一方面削弱了歐盟的軍事能力。在此情況下，看似北約能在其與歐盟的競合中取得優勢地位；但若從英國脫歐削弱西方盟邦團結一層面思考，英國脫歐將反而對北約帶來負面影響（Dunn and Webber, 2016: 471-480; Yost, 2014: 471）。在軍費支出方面，英國脫歐後為離歐付出大額費用，另外許多企業設於英國的總部已大規模遷出，包括大量金融銀行業。「分手費」及企業出走影響了英國經濟，國際貨幣基金及財金專家因此指出英國經濟因英國脫歐遭受衝擊。在這樣的情況下，英國在海外防衛支援的支出預期將會有所刪減，這對西方陣營來講將不是一件好事（Bond, 2016）。英國離開歐盟後，歐洲對於北約的軍事貢獻比將降得更低，可能會引起美國對歐盟在軍費投入一事上更大的不滿（賴昀辰，2020：137-139）。雖然英國在退歐後因其北約會員國地位，仍會留於美歐同盟的安全合作之中，但英國的退歐仍無可避免的對北約與歐盟合作造成影響。美歐同盟未來的挑戰是，如何在溝通渠道弱化的框架下持續保持歐盟與北約的緊密合作關係。

三、大西洋安全合作的調整

在反全球化及非傳統安全威脅不斷興起的當代，美歐內部民族主義、孤立主義以及民粹主義的盛行（Oliver and Williams, 2016: 552），使對抗安全威脅的合作面臨嚴峻挑戰。大西洋兩岸的領導人在脫歐公投結果出爐後，立即紛紛發言穩定民心（Mix, 2015）。如歐巴馬立即做出「英國是美國不可或缺的夥伴、美英仍維持特殊關係、英國在北約的參與是美國外交安全政策的基石」等發言（Dimitrova, 2016）。英國及歐盟的政治領導人亦表達維持英國在北約中的意願，表示不應將

北約與英國脫歐談判混為一談。歐洲執委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ker）說，「安全政策及貿易政策不應該被放在同一個籃中」。英國政府則重申其對歐洲防衛的承諾不會受到英國脫歐談判影響。而在北約方面，秘書長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在脫歐公投結果出爐後即公開表示英國脫歐不會影響北約；脫歐公投隔日，北約前總司令史塔伏瑞迪斯（James Starvridis）評論英國脫歐對北約有利，因為英國可將資源及精力全力投入北約（賴昀辰，2020：141）。由上述言論可見美歐力求將英國脫歐對美歐安全的衝擊減至最低。

2016 年英國脫歐公投後數日，歐盟立即發布歐盟外交與安全全球戰略文件（EU Global Strategy for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勾勒歐盟未來因應的安全挑戰及應對方式，以彰顯歐盟的團結及加強歐盟安全防衛政策的意向（賴昀辰，2020：142）。歐盟強調其戰略不會與北約任務重複，而是著重內在及外在的挑戰，如恐怖主義、複合性威脅、網路能源安全等（Freedman, 2016: 7-12）。另為追求戰略自主性，歐盟著重公民軍事層面的任務及能力，以此區別與北約著重國家軍事能力之差異。

歐盟 2016 年的全球策略強調建立更緊密的大西洋，以及透過北約維持大西洋夥伴關係，這樣的方向事實上帶有濃厚的英國色彩，與英國的立場因其強調北約與歐盟關係的重要性，將北約視為集體防衛的主要框架及大西洋安全的基礎，同時也認識到良好的跨大西洋關係建立在歐洲須為自己的安全承擔更大責任之前提（Bond, 2016），這與英國一貫的立場十分相似。在這樣的合作意願下，歐盟與北約找到合作著力點，歐盟理事會主席圖斯克（Donald Tusk）、執委會主席容克，與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立即於 2016 年 7 月簽署共同宣言，¹² 而歐盟理事會與北約外長會議於 12 月通過了歐盟—北約的合作提案，規劃了

¹²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21481/nato-eu-declaration-8-july-en-final.pdf>.

涉及七個合作領域的 42 項合作項目。

除在英國脫歐公投後立刻重新加固與北約的關係外，隨著另一股反全球化勢力代表的川普於 2017 年上任使美國對北約參與意願下降之情勢，歐盟積極思考發展自身的安全軍事能力。2017 年的北約高峰會中，川普直指歐盟 28 個盟國中尚有 23 國之軍費支出未達標準，批評歐洲盟國在軍費上的短支對美國不公。同時川普在此峰會中未談及北約憲章第 5 條之共同防禦原則，這是自杜魯門總統以來，首位未公開為此原則背書之美國總統。¹³ 美國在川普的主導下，對於北約的支持似將動搖，歐盟因應川普的態度，於是加速發展歐洲戰略自主。

早期在創建歐洲安全防衛政策時，由於擔憂歐盟與北約功能重複，英國對安全防衛政策多所質疑，英國之離歐等於為歐洲自主防衛能力創造空間。美國國會的國情報告就認為英國脫歐會使歐盟更快速發展 CSDP，因為過去英國常否決 CSDP 的發展，如 2011 年時英國阻擋了歐盟成立常設行動總部來強化歐盟指揮架構的提案 (Mix, 2015)。換句話說，英國脫歐雖然會使歐盟失去英國在軍事經驗及軍事能力面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來講，歐盟內部對歐洲軍隊的反對聲音將不再，而這為歐盟創建軍隊製造空間 (賴昀辰，2020：144)。

除了北約與歐盟的競合關係外，對俄制裁亦為美歐安全合作的另一觀察焦點。基於地緣政治、經濟往來及能源依賴，歐洲與美國對俄羅斯的敏感度不同；而在歐洲內部，英國與歐陸國家又有所差異。首先，英國的地理位置與歐陸國家不同，因英國如美國般未處於衝突的第一線；而在能源上，英國亦未如歐陸國家仰賴俄國能源進口，故英國是歐盟中最支持制裁俄國的會員國。根據美國國會國情報告，美國官員擔憂英國脫歐會鬆動歐盟對俄制裁 (Mix, 2015)，因為歐盟中早

13 The Real Donald Trump on show in Brussels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2cf2c0d0-4215-11e7-82b6-896b95f30f58>.

有重新檢視對俄制裁的聲音，如 2015 年即有德奧官員提出該檢討對俄政策（Archick, 2016）。因此有專家認為英國脫歐是普丁的勝利，將導致歐盟政策的軟化。俄羅斯市長蘇博雅寧（Sergey Sobyenin）甚至說，「沒了英國，歐盟就不會動真格制裁俄羅斯了」（De Luce and McLeary, 2016）。

上述歐盟自主防衛能力及對俄問題為外界對於美歐安全合作發展的憂慮，然而事實的發展卻比預期來得樂觀。首先，雖如外界對歐盟防衛能力之預期，歐盟 25 個會員國，¹⁴ 於 2017 年底簽訂永久性結構防衛合作協定（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以下簡稱 PESCO），宣布往歐洲防衛聯盟發展的意向，然而這樣的走向卻未如預測地引起歐盟與北約的緊張。歐盟與北約早在 2016 年底即已以七個領域擘畫未來的合作，而北約亦對歐盟 2017 年的 PESCO 協議表達正面看法，並強調北約與歐盟的發展須有更深的協調以求政策連貫，避免對成員國的要求出現矛盾。在 PESCO 提出後，北約成員國外長亦與歐盟會面，決定進一步加強與歐盟合作，以提升雙方的軍事機動能力及反恐合作。¹⁵ 而在對俄問題上，事實的發展亦未如前述的擔憂悲觀。基於俄羅斯對大西洋的整體威脅仍然存在，歐盟目前對俄立場並未因英國脫歐而有太大的變化，亦未見歐盟與美國在對俄羅斯制裁議題上有立即的矛盾出現。簡言之，歐盟與北約在脫歐公投後調整關係以展現護衛歐洲安全的決心。

未來大西洋兩岸間的安全合作發展在英國脫歐後仍需持續觀察。為維持大西洋安全合作中舉足輕重的地位，英國須積極維持在北約的角色，因為北約將是英國唯一能直接影響歐洲安全的多邊機制。英國角色的轉換可能使這兩個組織間原有的合作框架發生變化，英國會更

¹⁴ 除英國外，另兩個未加入的會員國為丹麥及馬爾他。

¹⁵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2/06/c_1122066774.htm.

加傾向以北約機制解決歐洲安全問題；而在歐盟，基於川普對北約的質疑態度，歐盟正建立歐盟戰略自主，但在此同時，歐盟也積極與北約維持積極合作關係，因此北約仍在美歐同盟的安全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肆、美歐安全與經濟合作調整之比較與分析

跨大西洋關係近一世紀來面臨數個轉捩點，第一個轉捩點是兩次世界大戰使美英開始建立關係；第二個是冷戰使大西洋兩端建立美歐同盟。冷戰的結束被視為是一個可能的轉捩點，因為共同安全威脅消失後，很有可能美歐同盟會因失去共同敵人而漸行漸遠，然而南斯拉夫戰爭證明了歐洲仍需要美國、伊拉克戰爭證明了美英特殊關係仍然存在。如今，2010 年代的跨大西洋關係面臨了進一步考驗—反全球化浪潮下的英國脫歐及走向孤立保守主義的美國，本章將從分析層次、2010 年代的泛政治化現象，乃至於大西洋聯盟的本質，來分析美歐同盟在 2010 年代的調整變化。雖然安全問題為高政治（high politics）問題、經濟問題為低政治（low politics）問題，看似位於兩個不同的層次，然安全與經濟合作無疑是美歐同盟的核心。故在探討美歐同盟時，須同時著眼此二核心議題，因此本章將從安全與經濟兩方面著手，分析及比較美歐同盟在此二核心議題上的調整與變化。

一、比較美歐同盟調整：分析層次的觀點

美歐同盟在 2010 年代在英國脫歐及川普掌政的結構下，於安全與經濟兩面面向上有著許多調整嘗試。從不同的分析層次來觀察美歐同盟面臨的變化，在全球層次上，主要是全球化作用帶來的反作用力使得美歐將重心放在國內事務，而在國際合作上趨於保守。全球化帶來總體經濟增長，但增長的果實卻無法讓社會中每一份子都感受到好處，

全球化帶來的財富集中於少數資本家，但弱勢族群卻成為全球化下被犧牲的對象，例如失業問題及食安問題皆伴隨著貿易開放而來。於是全球化中的輸家對全球化提出質疑，而這樣的質疑在 2016 年達到高峰，直接反應在英國脫歐公投、美國總統大選，及其後數場歐洲選舉上。簡言之，美歐關係變局在全球層次上是因其主導的全球化無法妥善處理經濟分配，導致內外對於其主導的政經秩序質疑聲浪四起，而造成雙方將重心放在國內事務，在國際合作上趨於保守所致。

在國內層次上，各國內部民粹勢力崛起影響了跨大西洋關係。不論是在美國或是在歐洲，右翼勢力在近幾場大選中皆大有斬獲。在美國，右翼勢力崛起導致川普當選，使美國孤立主義再興，影響了美國積極介入歐洲安全及維繫跨大西洋關係的戰略。在英國，民粹勢力是英國脫歐的直接因素，為跨大西洋關係投下變數。而德法的民粹勢力雖然目前大多聚焦於反歐洲統合，但反歐洲統合的立場代表著孤立主義且弱化了歐盟，使歐盟作為一個整體穩定美歐同盟之努力充滿荊棘。而個人層次的政治領導人之抉擇造成了當下的困境。英國首相卡麥隆的政治豪賭帶來了脫歐結果、美國總統川普一方面將美國帶向孤立保守，一方面其不按常理出牌的行事作風常造成盟邦的質疑，成為現今跨大西洋關係中的不穩定因子。川普的「美國再次偉大」競選口號及對歐盟不時的批評，為跨大西洋關係製造緊張。

跨大西洋關係面臨挑戰，細究目前美歐同盟的調整，可發現安全議題與經濟議題的調整速度不同，在安全上的調整可說比經濟議題來得快且有共識。在安全議題上，跨大西洋關係面臨歐盟與北約競合的問題。然而在脫歐公投後，歐盟與北約不斷重申其合作的意願及決心。歐盟與北約在 2016 年年底達成了實質的新框架協議，拓展涉及七領域的 42 項合作。自 2016 年的北約華沙高峰會以來，北約及歐盟致力於在安全議題上有更緊密的合作，包括海軍政策、網路安全、戰略溝通以及軍隊移動（Keohane, 2018）。另一方面，即使歐盟在沒了英

國的制約後創建了 PESCO，但這樣的協議卻未如外界評估般引起北約與歐盟關係緊張，北約反而表示樂觀其成。如北約外長史托騰伯格就認為，歐盟深化防務的行動有助於增加歐盟國家國防開支與軍事現代化，將有利於盟友公平分攤軍費，同時亦強調歐盟防衛能力與北約的互補性。¹⁶ 美國方面雖未對 PESCO 有官方評論，但從北約反應來看，至少美國對此防衛協議不致反感；而歐盟在創建 PESCO 後，軍事資源的投入將增加，這更是對川普的正面回應。簡言之，目前北約與歐盟的安全調整上有著正向的基礎共識。

相較安全合作的調整，美歐間在經濟議題的合作則顯得徒勞無功。TTIP 在英國脫歐及川普當選後進入休眠狀態（李貴英，2017：121-148），歐洲與英國埋首於脫歐問題，而川普對自由貿易協定的質疑更使美國對外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停擺。雖日前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曾表示重啓 TTIP 談判意願（Larocco, 2017），但至今尚未看到明顯進展。即使川普及容克於 2018 年表示建立美歐貿易零關稅區的意向，但這不代表美歐的經濟合作有實質進展，因為事實上美歐間的關稅已降得很低（Capaldo, 2014; Raza et al., 2014），譬如先前 TTIP 的癥結點是在非關稅障礙，而與關稅較無關。簡言之，美歐之間的經濟合作調整尚未有長足進展，進行已久的 TTIP 陷入僵局，而最新的意向則僅是初步構想。TTIP 案例帶來的啓示是，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美歐同盟經濟合作面臨質疑，若下階段的「零關稅區」構想仍持續 TTIP 的路徑僅處理市場開放卻忽略經濟分配議題，則這樣新自由主義基礎下的「零關稅區」前景將不甚樂觀。而除了在 TTIP 談判的僵局外，當今美歐之間另一個經濟合作的矛盾點在於 WTO 的改革問題。川普自美中貿易戰以來對 WTO 的機制及效用多所批評，甚而遲遲不願同意上訴機構的新法官任命，癱瘓了 WTO 的爭端解決機制，而歐盟則

¹⁶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2/06/c_1122066774.htm.

站在支持 WTO 的立場，重申爭端解決機制的重要係，呼籲美國應盡快任命上訴法官。簡言之，雖然美國與歐盟的經貿往來仍然緊密，但在經濟合作議題上，不論是 TTIP 談判或是 WTO 問題，皆多有所矛盾。

二、比較經濟與安全合作發展速度

觀察大西洋合作在安全與經濟議題上的調整，可發現美歐在兩議題上的進展有所差異。美歐同盟塑造了國際政經秩序，雙方是彼此在國際舞台上最緊密的安全與經濟夥伴，但若細究安全與經濟議題合作，一般對於大西洋經濟合作的發展比對安全合作的預期來得樂觀，因為當代自由經濟秩序由大西洋共同塑造，大西洋在推動自由經濟上有共同利益；反觀安全層面，冷戰的結束代表共同安全威脅消失，大西洋安全合作存續的必要性開始受到質疑（Daalder, 2000）。然觀察大西洋面臨反全球化衝擊後在安全及經濟議題合作的調整，卻可發現安全的調整比經濟來得快速，這樣的發展與一般的預期有所出入，值得深究其原因。本節試圖以泛政治化觀點及現實主義理論觀點，來分析造成大西洋關係在安全及經濟合作發展上的差異。

（一）泛政治化觀點：民意的限制

上節從各層次分析跨大西洋關係面臨的挑戰，這亦可解釋為何跨大西洋關係調整中，安全面向會比經濟面向來得成功。跨大西洋關係變局在全球層次上源於反全球化力量。而這股反全球化浪潮主要來自於對經濟增長分配不均的抗議，因此企圖加速貿易自由化卻未妥善處理經濟分配的 TTIP 自然面臨更大的質疑。安全議題亦因反全球化運動隱含的孤立主義受到波及，但安全合作非為反全球化運動的直接批判對象，因此安全關係的調整不似經濟關係面臨如此大的公眾關注。

在國際層次上，共同威脅的存在與否影響跨大西洋關係調整的快慢。冷戰結束後蘇聯瓦解，看似西方陣營的共同敵人不再，然近期俄

國於克里米亞的行動重新引起西方陣營的危機意識，再加上近年恐怖攻擊在西方國家頻傳，面臨共同威脅的感受在西方世界內再起，帶來大西洋安全關係的成功調整。而在經濟層面上，美歐間的共同威脅未如此明確。中國是美歐在經濟上的最大對手，但美國現今對中國所採取的硬保護主義卻與歐盟對中較溫和交往的立場有所不同，因此在經濟上，由於缺乏共同立場，合作的調整較為緩慢。

就國內層次觀察，民意對跨大西洋關係的調整有高度影響。民調對 PESCO 持正面看法 (Koenig, 2017)，而歐洲民眾對北約的好感度亦很高。在英國脫歐公投後，北約的好感度在大多數的國家呈現上升的態勢。¹⁷ 由此可見，歐洲民眾信賴北約提供的安全保護。為顧及民眾的看法，歐盟在發展防衛能力之餘，仍積極與北約保持良好關係。反觀 TTIP，民眾觀感近年急速下降。從民調來看，TTIP 被提出的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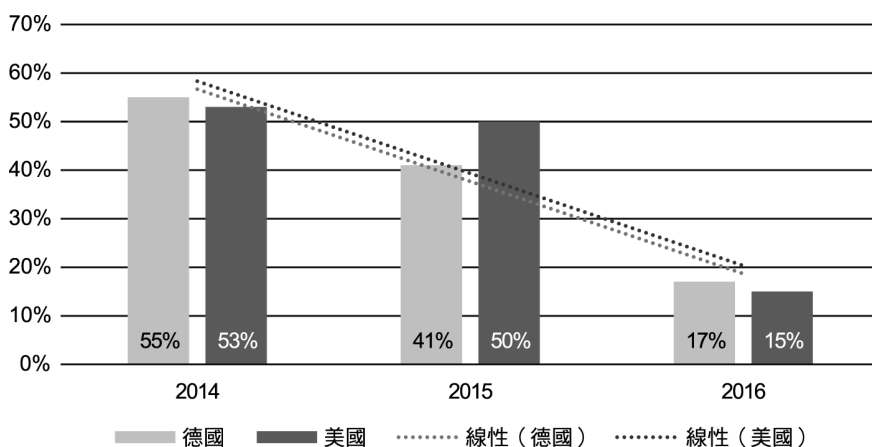


圖 3 對 TTIP 持好感度的德國及美國民眾百分比

資料來源：貝塔斯曼基金會及 Statista¹⁸

¹⁷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37/survey/all/>.

¹⁸ https://www.bertelsmann-stiftung.de/fileadmin/files/BSt/Publikationen/GrauePublikationen/NW_Attitudes_global_trade_and_TTIP.pdf.

年，大西洋兩岸皆有絕對多數的民眾支持 TTIP；然而自 2015 年起，正面觀感急遽下降，在美國雖仍有一半民眾支持 TTIP，但在德國卻只剩下 41%。這樣的情況在 2016 年變得更為險峻，不論是德國或美國，支持 TTIP 的民眾都未達 20%，只剩 2014 年時的 1/3。在民眾質疑的情況下，大西洋兩岸的政治菁英自然無法以 TTIP 來調整大西洋經濟關係。

從上述觀察來看，造成跨大西洋關係調整差異的主要原因在於民意的制約。2010 年代的一個重要特色，是反全球化運動興起及民粹主義發展，而這樣的變化造成國際合作的制約。國際合作由於往往牽涉到技術層面，一般民眾較難掌握，因此國際合作事務傳統上多由政治菁英主導，但近期公眾卻對國際事務的關注持續上升，帶來了對全球化的質疑乃至於民粹主義興起，國際政治學界遂開始關注這股公民力量對國際合作造成的制約，而有了對「泛政治化現象」的理論建構與觀察（賴昀辰，2020）。泛政治化現象指的是政黨政治與大眾政治彼此互動的情況下，議題的決策辯論強度不斷上升（Hooghe and Marks, 2009），在此過程中，極化的公眾意見、公眾利益、公眾價值進入政策決策內，且此意見、利益或價值被廣為宣傳而獲取公眾關注，以獲得政治權力分配（De Wilde, 2011: 560, 566-67），在這樣政治系統衝突範圍的擴展中，議題由技術官僚討論擴展到大眾政治（Grande and Hutter, 2016）。¹⁹

2010 年代的美歐關係亦受到上述泛政治化作用影響，受到國際議題泛政治化此一潮流的制約。一方面其面臨了高度的公眾關注，一方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427033/americans-views-on-the-transatlantic-trade-and-investment-partnership-ttip/>.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427028/germans-views-on-transatlantic-trade-and-investment-partnership-ttip/>.

¹⁹ 泛政治化現象見於上述學者間對於後功能主義理論的探討。

面此公眾關注制約了政治菁英對於國際合作的擘畫，為早期美歐合作由政治菁英主導的傳統結構帶來了變化。表 1 試圖由「公眾關注」及「公眾與政治菁英間之分歧」來描繪國際議題的主導結構，格（一）表示公眾高度關注國際議題，然而公眾與政治菁英之間具有落差，甚至是政治菁英之間亦有著不同的分歧；而格（二）則表示公眾與政治菁英之間的議題分歧高，但公眾關注度低；格（三）表示公眾高度關注議題，但與政治菁英之間的分歧低；最後格（四）則表示公眾與政治菁英之間的分歧度低、公眾亦不關心此議題。邏輯上而言，當公眾對議題較不關心，則與政治菁英之間的分歧就較不會發生，也就是格（二）在邏輯上來講是較不可能的，只會有格（四）——公眾關注低，則與政治菁英分歧議會較低這樣的狀況，早期的美歐國際合作屬於格（四）的情形。然而現今的公眾關注改變後，為國際議題的主導結構帶來改變，使得國際合作議題離開了格（四）的位置。

表 1 國際議題的主導結構

		公 衆 關 注	
		高	低
公眾與政治 菁英的分歧	高	（一） 公眾制約 （2010 年代的美歐經濟關係）	（二） X
	低	（三） 高正當性的政治菁英領導 （2010 年代的美歐政治關係）	（四） 低正當性的政治菁英主導 （早期的美歐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在同樣的泛政治化潮流結構下，美歐同盟在政治與經濟的調整卻有不同的發展，而造成此差異的原因在於公眾與政治菁英的分歧。在經濟議題上，由於反全球化浪潮的作用，使得公眾高度關注經濟貿易

合作議題，美歐等高度開發國家的部分民眾作為全球化現象的犧牲者，使得公眾對於進一步的經貿合作帶著高度質疑，而這與政治菁英希望推動美歐貿易夥伴關係的政策走向背道而馳，於是美歐的經濟合作面臨高度的公眾制約，因此移動至了格（一）位置。而在安全合作上，雖然近期因為敘利亞問題及烏克蘭問題，亦使得民眾開始關注安全合作議題，但美歐作為安全上的命運共同體，不管是政治菁英還是民眾，都期待強化美歐間的安全合作，因此公眾與政治菁英之間的落差不大，移動至了（二）位置。簡言之，兩種議題中公眾與政治菁英分歧度的不同，造成了美歐經濟與安全發展的差異。相對於經濟議題在泛政治化現象後面臨了高度公眾制約而發展停滯，泛政治化現象後的美歐安全合作反而是在有了公眾關注後，使政治菁英有了更高的正當性，於是發展更為順利。

（二）現實主義理論觀點：美歐同盟的不對稱關係－安全與經濟關係的本質差異

從現實主義的戰略權力觀點來看，美歐同盟的本質亦是造成安全與經濟合作發展差異的原因。在安全上，美歐同盟的本質為「依賴關係」，歐洲需要美國的安全承諾，而美國的安全承諾則透過北約來實現，美國及北約對歐洲安全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英國出走後，分裂的歐洲對美國安全承諾的需求又更加深，因此歐洲在創建自我防衛能力之際，亦積極與北約維持合作關係。另一方面，歐洲與美國在安全議題的權力不對等亦使北約對美國有重要性存在。對美國而言，歐洲對其的安全依賴，使歐洲成為美國最忠實的盟友，歐洲的支持可強化美國全球霸權地位，因此美國亦需要維持美歐關係，而北約則是美國得以介入歐洲事務的重要渠道。更甚者，北約現今往主動性、介入性轉型的走向（甘逸驊，2003：1-23），提供美國介入全球事務的正當性，因此美國需要北約的存在。簡單的來講，雖然美歐在安全議題上權力

不對等，但雙方對彼此皆有需求，因此美歐同盟在安全合作的依賴本質上重視的是絕對收益，創造了合作空間。

在經濟合作上，美歐同盟的本質則是「既合作又競爭」，與安全議題的依賴本質不同。美歐共同塑造了當代以新自由主義為主桌的經濟秩序，然而之間也存在著爭取對外貿易市場的競爭關係。這樣的競爭在全球化時代尤為激烈，使得美歐在經濟面上重視的是相對收益。英國脫歐後，一方面英國與歐盟的經濟緊密度減低，一方面歐盟的總體經濟實力下降，則美國在經濟的競爭上將更顯優勢，同時能彈性的以不同的方式來處理美歐經貿關係及美英經貿關係。因此美國仍在觀望要如何取得最大利益，而不輕言調整雙方經濟關係。兩種領域的不同利益思考使美歐在安全與經濟的調整不同步。

雖然川普一再質疑北約及批評歐洲的軍費支出過低，但就戰略思考來看，美國不太可能撤出北約，否則美國將失去介入歐洲的力矩。川普的言論應被理解為提高歐洲軍事支出以降低美國負擔的政治語言，而非真的要退出北約，因此我們看到北約與歐盟在近期的關係強化。而在經濟上，英國脫歐使 TTIP 強化美歐同盟的戰略目的失衡，因為 TTIP 不再能完全包覆大西洋兩岸，而須調整納入英國才能達成原本目的。在歐英間已為脫歐焦頭爛額之際，歐英實無餘力分心於 TTIP 制度設計。目前歐英脫歐後之貿易談判仍在進行中，若歐英間能達成協議實行軟脫歐，則英國仍有可能進入 TTIP 建制中，但若採取無協議硬脫歐，則英國加入 TTIP 機會將十分渺茫。而對美國而言，英國脫離歐盟後，美國可對英國採用不同的貿易關係，尤其是若英國採取無協議硬脫歐，則美國將不再需要給予歐洲及英國同等貿易待遇，或可使美國在經貿競爭上更有優勢。簡單來講，歐洲及英國目前尚無餘力重新調整 TTIP 或思考新的貿易安排，而美國則是靜待脫歐結果而謀後動才較符合國家利益，亦缺乏立刻促成新貿易合作的誘因。在這樣的思考下，目前經濟同盟的調整自然較為停滯。

安全與經濟一為高政治議題，一為低政治議題，在本質上有所差異，因此造成了雙方在合作的考量上有所不同。雖然跨大西洋關係在安全的調整比經濟調整來得快，但近期美歐逐漸在經濟上有對話出現。2018 年以來美國貿易動作頻頻，川普與容克在 2018 年 7 月宣佈推動美歐零關稅區，美歐貿易合作關係似有回溫跡象。雖然關稅不是美歐貿易的主要癥點，但若美歐能持續進行貿易協商，則美歐之間或許能夠在經濟合作上有所進展。然而川普的反覆仍值關注，畢竟在 2018 年 6 月時，美歐才因鋼鋁關稅問題不睦，川普訪歐時釋出的善意究竟是真心實意或僅為外交辭令，須密切觀察。

伍、結論

大西洋兩岸的重要行為者美國、歐盟，及近期決定離開歐盟的英國，基於二次世界大戰及冷戰的需求，建立了緊密的美歐同盟。歐洲在美國的幫助下經濟復甦並確保安全，而能以歐洲統合在國際舞台上佔重要地位；英國靠著美英特殊關係及歐盟會員身份，巧妙游走美歐間重獲大國角色。另一方面，美國需要盟邦作為其建構世界秩序的支持者；而為了影響歐盟政策方針，美國也需要英國作為通往歐洲的橋樑。美英歐對彼此的需求，建立起緊密的美歐同盟，然而 2010 年代的政治發展包括反全球化浪潮崛起、英國脫歐、川普掌政等，為國際政治帶來地震，衝擊了美歐關係。

面臨全球市場經濟的力量，越來越多公民感受到經濟與文化的不安全感，因此大西洋兩岸出現恢復國家自主權的主張（Wyplosz, 2016: 143-148），英國脫歐「拿回控制」（Take back control）的口號與美國川普「使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遙相呼應（Pabst, 2016: 190）。而在歐陸，反統合的疑歐派力量不斷上升，除英國脫歐外，德、奧、義、匈、波等國近年的選舉皆反映民粹在歐洲復興的事

實，為歐洲團結帶來挑戰。換句話說，反全球化浪潮與民粹主義衝擊了西方自二次大戰結束後建立的政治秩序。

2010 年代是個反全球化意識高漲的時代，民意在外交事務的重要性急遽成長。過往外交事務多由政治官僚主導，然從上節圖 3 的快速民意更迭，可發現民眾對外交事務越來越有感，外交決策受到公民嚴格檢視。在此情況下，國家領導人的角色越來越突出，因為當文官體系的政治官僚不受到公民信任，由公民選舉出的國家領導人將可有更大的話語權、領導人風格對外交關係之影響擴大，因此川普個人對美歐同盟有很大的影響力。簡言之，美歐同盟現今面臨的挑戰可從全球層次的反全球化浪潮談起，影響至國際層次的英國脫歐，並在國內層次上反映出公民的外交意識急遽成長，連動的是個人領導在外交關係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以上四層次因素於是影響著美歐同盟在安全及經濟關係的調整成果。

2010 年代在反全球化浪潮的陣陣衝擊下，跨大西洋關係在經濟面上面臨僵局，反倒是在安全上，歐盟在簽訂 PESCO 同時也深化與北約的合作。因此同樣面臨反全球化浪潮衝擊，美歐同盟的安全與經濟關係卻有不同命運。這是因為英國脫歐帶來歐洲分裂的情況下，歐洲為確保安全須更加仰賴美歐同盟；而在經濟上，英國脫歐帶來的分裂給予美國貿易競爭優勢，美國可待英國脫歐結果明朗後再行調整美歐 / 美英貿易關係。從這兩方面的差異，可發現美歐同盟間的天秤更向美國傾斜，美國在這波變局中取得更大發言權。雖然川普不時引起歐盟不悅，但歐洲最終還是如其所願調高軍事支出，以及與川普共同提出新貿易安排構想，由此可見美國之強勢地位。

若要在種種變局下重新鞏固美歐同盟，美歐領導人的課題是，如何減低當代反全球化浪潮帶來的孤立主義、重新團結內部力量。歐盟及英國要思考如何調整與孤立主義甚囂塵上的美國關係；歐洲需要美國及北約來回應外界對西方團結度的質疑以保障歐洲安全、而英國要

調整向來以大西洋橋樑取得國際政治領導者地位之戰略，防止英國不會在失去大西洋橋樑角色後在國際舞台邊緣化。而對美國而言，分化的盟邦將不利支持美國主導全球秩序，因此需設法重新鞏固美歐同盟（賴昀辰，2020：145-146）。未來美歐同盟最根本的挑戰是回應泛政治化現象中對於反全球化質疑，大西洋兩岸的政府須正視反全球化浪潮對分配不均的抗議，方能重新鞏固內部向心力，否則英國脫歐將只是反建制的開端，大西洋兩岸構築的國際秩序將不斷面臨質疑與挑戰，影響美歐同盟在國際舞台的領導地位。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甘逸驊（2003）。〈北約東擴—軍事聯盟的變遷與政治意涵〉，《問題與研究》42(4)：1-23。
- 李貴英（2017）。〈歐美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定之興起與挑戰〉，《政治科學論叢》72：121-148。
- 周子欽（2020）。〈區域整合脈絡下的「一代一路」：地緣政治經濟觀點〉，《全球政治評論》69：63-92。
- 張鳴（2012）。《重說中國近代史》。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 湯紹成（2000）。〈後冷戰時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角色與公約的轉變〉，《問題與研究》39(1)。
- 劉大年（2019）。〈美國川普政府的貿易政策〉，《經濟前瞻》185：9-21。
- 賴昀辰（2016）。〈解析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理想與現實的可能矛盾〉，《政治科學論叢》70：121-158。
- 賴昀辰（2020）。〈英國脫歐後的美歐英安全合作展望〉，李貴英、吳志成（編）《英國脫歐與歐洲轉型》。台北：臺大出版中心。
- 賴昀辰（2020）。〈歐洲議題政治化現象之分析〉，《臺灣民主季刊》16(4)：39-92。
- BBC News | 中文（2016）。〈歐盟與美國自由貿易協議談判「已經失敗」〉。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6/08/160828_german_us。2020/06/25 檢索。

二、英文部分

- Akhtar, Shayerah Ilias (2017). "U.S.-UK Free Trade Agreement:

- Prospects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4.
- Archick, Kristin (2016). “The European Union: Current Challenges and Future Prospect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1.
- Bendini, Roberto, and De Micco, Pasquale (2014). “The Expected Impact of the Ttip on EU Member States and Selected Third Countries.”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xternal Policies Policy Department, European Parliament*.
- Biscop, S. (2016). “All or Nothing? The EU Global Strategy and Defence Policy after the Brexit.”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37(3): 431-445.
- Bizzarri, K. (2013). “A Brave New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 The Proposed EU-US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TAFTA) and Its Socio-Economic &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Seattle to Brussels Network*.
- Blockmans, S. (2016). “Brexit, Globalis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EU.” *Intereconomics* 51(4): 182-183.
- Bond, Ian (2016). “NATO, the EU and Brexit: Joining Forces?”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https://www.cer.eu/insights/nato-eu-and-brex-it-joining-forces>. Retrieval Date: 2018/07/13.
- Brânda, Oana-Elena (2017). “NATO-EU Relations in the Aftermath of Brexit.”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Strategies XXI*,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Taoyuan, April 6.
- Bremmer, Ian (2016). “The Hallow Alliance.” *Time*. <http://time.com/4371195/nato-transatlantic-alliance-us-europe/>. Retrieval Date: 2018/07/16.
- Bugajski, J. (2016). “Only NATO Can Defend Europe.” *European*

View 15: 27-35.

- Capaldo, J. (2014).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European Disinte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Instability." *Glob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14(3).
- Crouch, C. (2014). "Democracy at a TTIP'ing Point: Seizing a Slim Chance to Reassert Democratic Sovereignty in Europe." *Juncture* 21(3): 176-181.
- Daalder, Ivo H. (2000). "Europe: Rebalancing the US-European Relationship."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europe-rebalancing-the-u-s-european-relationship/>. Retrieval Date: 2020/06/30.
- De Luce, Dan, and McLeary, Paul (2016). "Brexit Is Good News for Russia, but a Headache for NATO." *Foreign Policy* 26.
- De Wilde, P. (2011). "No polity for old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politicization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33(5): 559-575.
- Defraigne, P. (2014). "Departing from TTIP and Going Plurilateral." *Madariaga Paper* 7(9).
- Dennison, James, and Oliver, Tim (2018). "Brexit and NATO: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The Dahrendorf Forum." *Dahrendorf Form: Debating Europe*. <http://www.dahrendorf-forum.eu/brexit-nato-eu-defence/>. Retrieval Date: 2018/07/13.
- Dimitrova, Anna (2016). "Troubled Times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urope in Trouble, Taipei, January.
- Dunn, David Hastings, and Mark Webber (2016). "The UK, the European Union and NATO: Brexit's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Global Affairs* 2(5): 471-480.

- European Union. (2016).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 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 Felbermayr, Gabriel, Larch, Mario, Flach, Lisandra, Yalcin Erdal, and Benz, Sebastian (2013). "Dimensions and Effects of a Transatlantic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 and US." Munich: Ifo Institute, Beringer.
- Francois, Joseph, Manchin, Miriam, Norberg Hanna, Pindyuk Olga and Tomberger. Patrick (2013). "Reducing Transatlantic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An Economic Assessment."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 Freedman, L. (2016). "Brexit and the 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Survival* 58(3): 7-12.
- Grande, E., & Hutter, S. (2016). "Beyond authority transfer: explaining the politicisation of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9(1): 23-43.
- Hamilton, Daniel S. (2014). "TTIP's Geostrategic Implications." *The Geopolitics of TTIP: Repositioning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for a Changing World*, edited by DS Hamilton.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 Hooghe, L., & Marks, G. (2009). "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23.
- House of Lords (2014).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 Keohane, Daniel (2018). "EU-NATO Alignment After Brexit - Carnegie Europe -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

- carnegieeurope.eu/strategieurope/75861. Retrieval Date: 2018/07/13.
- Kienzle, Benjamin, and von Weitershausen, Inez (2017). “Brexit Has Given an Impetus to Reshape Europe’s Foreig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ies.” *LSE Brexit*. <https://blogs.lse.ac.uk/brexit/2017/05/02/brexit-has-given-an-impetus-to-reshape-europes-foreign-security-and-defence-policies/>. Retrieval Date: 2018/07/15.
- Koenig, Nicole (2017). “What the French and the Germans Really Think About a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Union.” *Jacques Delors Institute Berlin*.
- Larik, J. (2018). “The New Transatlantic Trigonometry: ‘Brexit’ and Europe’s Treaty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LaRocco, Lori Ann (2017). “Wilbur Ross Says He’s ‘Open to Resuming’ Talks on Mega-Trade Deal with Europe”. *CNBC* <https://www.cnbc.com/2017/05/30/exclusive-wilbur-ross-says-hes-open-to-resuming-ttip-negotiations.html>. Retrieval Date: 2017/06/22.
- Lawder, David (2016). “The US-UK ‘special Relationship’ Is Too Important to Be Impacted by Brexit - Business Insider.”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r-us-uk-alliance-seen-outweighing-br-exit-trade-concerns-2016-6>. Retrieval Date: 2018/07/13.
- Lightfoot, Jeffrey, and Oliver, Tim (2013). “Britain Outside Europe? The US View.” *Atlantic Council*.
- Lightfoot, Jeffrey, and Oliver, Tim (2016). “A UK-EU Divorce: Bad News for America,” *The National Interest*.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uk-eu-divorce-bad-news-america-9487>. Retrieval Date: 2016/12/25.

- Mix, Derek E. (2015). "The United Kingdom: Background an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Members and Committees of Congress*.
-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Post-West (2017). "Post-Truth, Post-West, Post-Order." *Munich Security Report*.
- Oliver, T. (2016). "A European Union without the United Kingdom." *Strategic Update* 6(1).
- Oliver, Tim, and Williams, Michael John (2016). "Special Relationships in Flux: Brexit and the Future of the US - EU and US - UK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Affairs* 92(3): 547-567.
- Pabst, A. (2016). "Brexit, Post-Libe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aradox." *Telos* 176: 189-201.
- Raza, Werner, Grumiller, Jan, Taylor, Lance, Tröster, Bernhard and Von Arnim, Rudi (2014). "Assess TTIP: Assessing the Claimed Benefits of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Austrian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Research*.
- Rodrik, D. (2017). "Too late to compensate free trade's losers." *Project Syndicate*, 11.
- Sanchez, Raf (2016). "Britain Leads Push to Convince Washington to Back Transatlantic Free Trade Deal." *The Telegraph*. <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economics/10329783/Britain-leads-push-to-convince-Washington-to-back-transatlantic-free-trade-deal.html>. Retrieval Date: 2020/06/25.
- Stalenheim, Petter, Perdomo, Catalina, and Sköns, Elisabeth (2007). "Military Expenditure, Sipri Yearbook 2007: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67-297.

- Stiglitz, Joseph (2014). "On the Wrong Side of Globaliz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4/03/15/on-the-wrong-side-of-globalization/>. Retrieval Date: 2014/03/15.
- Stokes, Doug & Richard G. Whitman. (2013) "Transatlantic Triagle? European and UK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US Rebalance to A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89(5): 1087-1107.
- Valasek, T. (2007). "The Roadmap to Better EU-NATO Relations." *London: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Briefing Note* 20.
- Venhaus, Marc (2015). "An Unequal Treaty—TTIP and Inequality in Europe." In *Progressive Economy*.
- Vukadinović, Lidija Čehulić, Begović, Monika, and Jušić, Luka (2017). "NATO in Europe: Between Weak European Allies and Strong Influence of Russian Federation." *Croat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23: 5-32.
- Williamson, J. G. (2005). Winners and losers over two centuries of globalization. In *Wider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pp. 136-174).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 Wyplosz, C. (2016). "The EU Must Adapt to Survive." In *Brexit Beckons: Thinking Ahead by Leading Economists*, edited by Richard Baldwin. Cambridge: CEFR Press: 143-148.
- Yost, David Scott (2014). *NATO's Balancing Act*.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in the 2010s: The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Yun-Chen Lai**

Abstract

US-Europe alliance has influenc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Recent national elections in the US and in Europe, including those in Germany, Austria, Italy and France etc., reflected the rising of populism and questioned the globalization and current political regimes. The national elections above would not only decide the domestic politics but also influence foreign policies and US-Europe alliance.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including the cooperation in the NATO an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EU and the NATO, and the frustration in the TTIP negotiation in recent years, finding that the adjustment in the security perspective is much quick than that in the economic one. The variation is due to the politic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ssue causing by anti-globalization and the different natures of economy and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relations is dependency, while that of economic relations i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future challenges of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are, how to respond to the question of anti-globalization, and how to adjust the US-EU-UK triangle after Brexit to rebuilt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Keywords: Atlantic Relation, NATO, TTIP, (anti-)Globalism, Brexit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Executive Director, EU Research Cent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Email: yunchen.lai@gms.ndhu.edu.tw